

# 批评家茶座

pipingjiachazuo

## No.2

第二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 【批评聚焦】 大学与现代教育制度
- 【何中华】 说不尽的大学
- 【沈卫威】 大学的精神空间
- 【李良玉】 匡亚明：大学的荣誉 大学的伤痛
- 【张 生】 相同的生活
- 【艾晓明】 从“男领导不能配女秘书”说开去
- 【金 天】 我们是否需要弗洛伊德？
- 【余世存】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
- 【杜 丽】 “知识”与“常识”



# 批评何为？

●钟永诚

写下这个疑问，是在《批评家茶座》第二辑即将付印的时候。依然记得当日决定做这样一本专事“批评”的小书之际的豪兴，当又一次翻检这些批评文字，却无法回避内心的叩视：我们做的批评究竟可以抵达何处？

第一辑出来后，许多学人对我们经营的这一方园地给予了关注和支持。王彬彬先生建议我们设立“民国旧事”和“旧书旧刊”两个栏目，杨玉圣先生则指出为了更好地成就自己的特色，应该更加侧重学术批评或学理意义上的批评。

“难道对这人生的裹挟真的就不能有所警惕、有所反省？在这被裹挟的人生就真的不能有所驻足、有所流连？我们真的就不能在急忙之时还有些从容？在急智之外还有些智慧？在情急之中还有些清凉？”这是李书磊先生发出的疑问，而收在这本小书里的这些文章，无论是对大学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还是对弗洛伊德意义的追问，都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生活的一种可贵的“警惕”与“反省”，这样的“驻足”与“流连”，透显出了“从容”与“智慧”，终于在无无浮躁的喧嚣中呈现出一片“清凉”。

余世存在阅读了70年代学人的理论文字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的知识在世界知识和现代理性的参照下，尚未能完成传统知识结构向现代知识体制的更新，如前说，知识体制必须容纳各方的知识创造，自由独立是其标准也是目的。”而杜丽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从一个普通劳动妇女教育孩子的场景中看到的竟也是我们知识体系的缺陷：“知识”易学，而“常识”难求——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是有‘知识’，更有‘学历’，但是没有‘文化’、没‘常识’。”

如果列位看官能够在“茶客”们的谈笑人生中看到“知识”的缺陷，看到“常识”的可贵，让我们的知识体系向着更健康更完备的方向前进一小步，这“批评”也就算多多少少有点意义了吧。

# 目 录

批评家茶座 第二辑

主 编 钟永诚

执行主编 李书磊

责任编辑 吴宏凯

特邀插图 孙国庆

黎 青

## 〔卷首语〕

钟永诚 批评何为? /1

## 〔批评聚焦:大学与现代教育制度〕

何中华 说不尽的大学/4

沈卫威 大学的精神空间/11

李良玉 匡亚明:大学的荣誉 大学的伤痛/17

张 生 相同的生活/25

## 〔文化时评〕

李 辉 底线——关于巴金赠书流失的随感/32

艾晓明 从“男领导不能配女秘书”说开去/37

金 天 我们是否需要弗洛伊德?/45

王列生 后挤压时代/49

张立宪 我的电脑生活/53

## 〔谈文斋〕

张清华 文学与刑罚/59

林 舟 新闻视野里的文学/66

李敬泽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73

余世存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70年代学人阅读札记/83

## 〔理论视点〕

道·凯尔纳 丁宁/译 看香烟广告/93

李文堂 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冲突/100

〔影音精神〕

崔卫平 张战庆 一个DV人和一部DV作品的诞生/108

张子扬 电视音乐与音乐电视/116

史航 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121

刘海波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关于电影《英雄》及其评论/126

〔捕书者说〕

赵琨 爱情里的存在哲学/134

唐岫敏 《哈里·波特》新集上市第一天——来自英国的报告/138

张志平 《围城》与《洗澡》:人生困境的展示与超越/142

〔书店街〕

郁文 我是一只企鹅,但没在南极洲/146

〔回眸〕

杨浪 一幅值得研究的日军侵华军用图/149

〔日常生活〕

杜丽 “知识”与“常识”/153

宝华 清洗语言/15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家茶座.第2辑/钟永诚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9-03366-1

I. 批… II. 钟… III. 文化学-文集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2970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30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0.00元

# 说不尽的大学

一提到“大学”这两个字，一般人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神圣之感。我们这样一个大到崇拜文治教化、小到敬惜字纸的民族，对于文化始终充满着格外的敬畏。在人们心目中，“大学”甚至成了“文化”的另一种说法。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大学”又寄托着教育救国的梦想，担当着民族拯救的使命。魏源的一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道出了国人的多少辛酸和希冀。近代中国大学的开办，就是“师夷”的结果。它承载着国人的多少光荣与梦想！然而吊诡的是，历史的后果未曾“制夷”，倒是有点“以夷变夏”的味道。这真有点类似于女权主义者曾遇到过的尴尬：消极迎合男权社会的霸权话语及其偏好，无疑是死路一条，只有“像男人那样活着”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但如此一来恰恰因丧失女性的内在尺度而被男性所同化，“解放的目标变成了解放的陷阱”，无论怎样都难以逃避被男权尺度所同化的命运，其差别仅仅在于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而已。我们的文化遭遇不是也面临着如此难堪的情境吗？

今天的大学说到底不过是现代性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它又多了一层，这就是它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还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

---

\*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

果。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 19 世纪末期，随着传统教育的衰落和现代新型高等教育的兴起，才逐渐出现的。”（〔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 页）这乃是中国大学在今天面临的全部尴尬之处。

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也许不无启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采取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其结果是教育被西方模式所同化。日本学者井深大指出：“日本近代教育是以‘赶超欧美’为出发点的，因此，其教育内容也全部吸收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开始时连教科书等也是翻译欧美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物理、化学等是过去日本没有的学问，自然只能翻译欧美的教科书来使用。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连国语课本也是翻译美国的威尔逊读本，在全国各学校使用。”（〔日〕井深大：《精神·道德·情操——无视另一半教育的日本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 页）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也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提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一个人有多少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判定”。（《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79 页）这样的教育模式除了能够培养出一大批“香蕉人”，还能有别的可能吗？从日本近代以来教育的命运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东方民族陷入的一个误区。其结果只能是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以至于出现一种极度的反弹。日本的“三岛由纪夫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民族主义以其极端的方式迸发出来，无疑是对过度西化的反弹。1970 年 11 月 25 日，三岛由纪夫以日本传统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 45 岁的生命。他在死前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看到，战后的日本受经济繁荣所陶醉，忘记了国家的基础，丧失了国民精神，舍本求末，陷入敷衍和伪善，自动地跳进了灵魂空虚的深渊。”（转引自唐月梅：《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

传》，作家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0 页）他的绝望在于，日本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的挤兑中逐步消逝。由此可见，文化上的原因乃是三岛之死最深刻的原因。它归根到底源自一种难以排解的文化焦虑。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事件。

类似的文化焦虑在中国学者那里有其深切的体验。例如，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生命般关怀和担当的钱穆先生，以其特有的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敏感和忧患，“看到一旦传统被抛弃，新的中国就会产生一大批（西方式的）技术人才，同时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美]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 页）再如蔡元培先生，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服膺进化论学说，但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试图弥合竞争与互助掇为两截的关系，用互助补充竞争（这颇类似于孙中山的观点）。而对互助论观念的强调则无疑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

然而，忧虑也好，补充也好，近代中国都未能实际阻挡住西方模式的同化步伐。正像国外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海外受训”。（转引自项贤明：《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载于《学术界》2002 年第 1 期，第 34 页）更深刻的在于，这种情形已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已经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人们不知道，在中国的“一流大学”梦、在大学教育“大跃进”当中，究竟还有多少本土化的考虑和用心？笔者对大学的本土化的强调，并非意在否定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也决非狭隘民族主义情结作祟，更不是极度自卑心理引发的自大狂式心态使然，问题仅仅在于文化开放只有建立在一种平等对话关系的基础上才可能是建设性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可怕的“自我殖民化”陷阱而难以自拔。它让人蓦然想起孟子的那句话：“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都是自己首

先瞧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人家才会轻蔑你、才能真正征服你。此类智慧，不知我们这些“现代的”东方人读懂了吗？

科学是现代性的代表。对科学的崇拜和迷信，导致了科学主义的出现。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症候。但是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对应于人的知性思维及其逻辑。科学，顾名思义，就是“分科治学”。它所带来的只能是“支离”和“分殊”，是“隔”而非“通”。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近代科学的最大特点是所谓“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在于，这只是自然科学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个暂时的特征，还是自然科学永远无法摆脱的普遍特征呢？恩格斯说过：“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91 页）

这就从思维方式的高度规定了科学与知性能力和知性逻辑之间的必然联系。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也无论当代科学出现了怎样的综合趋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分科治学的本性。因此，在科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庄子·天下篇》批评过的那种可悲局面：“……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以现代医学为例：它把人变成纯粹知识的对象，当它成为医院设计的合法性来源时，就不能不积淀为制度安排。例如，人作为患者一旦进入医院，就沦为越来越详细划分的科室“切割”的对象，从而被“肢解”为一堆机械堆砌的“原子”。于是，活生生的“人”消逝了。现代医院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不啻隐喻了现代知识和体制的特点。分科治学在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规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制度的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的割裂。它使得人们不再能够以本体论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不再能够从总体上亲近和感受他们所属的这个世界。人们获得的只是作为“百家众技”之一的一技之长而已，失去的却是对整个世界的洞见能力和睿智。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工匠式的人物越来越多以至于过剩，而大师级的人物却越来越少以至

于缺席的重要原因所在。因为真正的大师只能是“通人”。海德格尔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说:“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343 页)

大学是自律的,这是大学精神最为深刻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一切可贵的精神质素,归根到底都由此生发出来。“欧洲大学最根本的学术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自治权和学术自由。”([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 页)这在西方大学的古典阶段表现得尤为充分。其实,这两者都植根于大学的自律性质。大学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这决定了它的自治权利和自治能力。大学并不是外在目的的从属物和附庸,而是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它因而规定了学术自由。自由的本义是“由自(己)”,亦即自我决定。只有出于自身本性而非出于外在的“他者”,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此而言,自由就是自律。大学的学术自由,来自大学的自律性质。但是,大学的这种自律性在当代已难以维系。市场逻辑注定了“适者生存”。它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就将把一切可能的领域都裹挟到竞争的轨道。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越来越深度的市场化取向,乃是眼下中国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大学担当着提升民族精神、积淀民族文化、建构文化道统的使命。因为大学代表着一个民族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文化水准。它涵养并提升着民族的精神境界。如果过分迎合市场需要,受制于市场逻辑的牵制,就有可能丧失自身的自主性,从而背离自己的天职,沦为一种高雅的媚俗。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深得个中三昧。1917 年 1 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就曾鲜明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

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3 页）正是蔡元培先生对学术的这种目的性追求，才成就了北京大学，于是也才有了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它至今仍不失其参照的价值和借鉴的意义。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及其实践表明，只有摆脱实用和功利的羁绊，大学才能真正回归到它自身。这也是大学的尊严和崇高之所在。然而，在今天，大学几近沦为职业培训所，从而使大学的本然之责尽失。这不能不说是大学的“失道”。本应该是“失道者寡助”，但今天的情形却不然，倒是“失道者多助”。因为职业训练恰恰迎合并满足了市场逻辑对大学的期许和塑造。

在一定意义上，市场逻辑不过是生物学逻辑在人类社会中的延伸。达尔文学说表明：“进化的变化一般说来总是趋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英] J·霍华德：《达尔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6 页）而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作为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恰恰体现了自然界进化的最一般原则，它所显示的不是人的存在方式同自然进化方式的断裂，而是连续与一致。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形态，乃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动物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尔萨斯对市民社会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集中在他的人口论学说当中），才能反过来启示达尔文对生物学规律的发现。在《物种起源》序言中，达尔文以其科学家的诚实坦率地承认，他的生物进化论的建立得益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奇妙联系，意味着市民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同生物世界的生存竞争之间具有连续性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说：“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

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1~252页)这难道不是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吗?但是,按照市场逻辑,以企业的方式“经营”大学,在商品经济原则宰制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今天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把高等教育当作产业来运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不少人对今天的大学还未被市场逻辑完全操纵而一直耿耿于怀,在这些人眼里,大学成了他们所谓“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必欲纳入市场而后快。把大学变成为工厂是这些改革者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理想。其实,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一块净土。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只必须不停地下蛋的老母鸡。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对你的期待,尤其是满足体制对你的“凝视”和“考查”。人们越来越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与业绩挂钩的奖惩制度就派上了用场。在这种“促逼”之下,大学的管理固然是企业化了,但它除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软皮蛋”之外,还会有别的结果吗?日益严重的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现象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倘若国人能够从今日大学的历史际遇中咀嚼出某些值得反思的东西,则中国大学幸甚,我们这个民族幸甚!这无疑是一个考验。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大学与现代教育制度〕

●沈卫威\*

# 大学的 精神空间

浙大因中央大学的师资而兴

这里先说 1920 年代中国的大学体制。

1920 年代初，中国的两所实力最强大的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师资流动和毕业生为 1928 年以后中国大学体制格局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在 1927 年以前，清华文科的底子已由北京大学初步打造起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有三位是北京大学的胡适推荐的。1928 年的新校长是北京大学出身的罗家伦，文科的冯友兰、朱自清、俞平伯、刘文典、杨振声等来自北京大学。作为文学院长的杨振声回忆说，清华的国文系是在他和朱自清手中而兴。同时朱自清也把“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在 1929 年上半年的清华大学开出。1930 年下半年他又把“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开到了燕京大学，随后又开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朱自清是被胡适推荐进清华的。而东南大学也把附近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的文科扶植起来了（主要是靠教授互聘）。

1927 年由广东大学改制为中山大学的文科，同样是靠北京大学扶植起来的。据 1927 年 8 月 25 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第 19 期的《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大都是出自北京大学。“除

\*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续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2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当然有一部分人并没有聘到，但多数人都到了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

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国学研究，特别是以“语言历史学”为路径和门类的学术研究的崛起，开学界新风。他们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他们也把《民俗》周刊办起来了。而“民俗学”特别是他们看好的歌谣等鲜活的民间文学，是胡适白话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接下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师资又把国立武汉大学扶植起来。1928年7月组建武

汉大学时，南京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南凯8人为筹备委员。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黄建中是北大毕业生，他们和随后从北京大学来的王世杰、陈源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尤多。其中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先后做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陈源作文学院院长时，经胡适推荐，1930年下半年聘了沈从文来教“新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和胡适进一步将“新文学研究”推到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武汉大学。

当然，“学衡派”的势力也因吴宓和刘永济的关系而渗透到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但在这两校并未形成文化主力，也没有占据主流话语。吴宓虽做了近两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但他不懂国学，也不是导师，所以他的工作和影响在外文系，以及依靠《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团结一批作者。四大导师有三人都是胡适推

荐的,另一位经吴宓推荐的陈寅恪后来也成了胡适的朋友。刘永济是吴宓的朋友,《学衡》的作者,他的影响在国文系,但武汉大学的领导层多年来是由来自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充实,他们都是胡适的朋友。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教师和毕业学生)在1924年以后,大都离开了东南大学(到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在经历了短暂的易名第四中山大学(1927年6月)、江苏大学(1928年3月)之后,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而在浙江省则由几个专科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由原北京大学代校长,浙江人蒋梦麟任校长。1928年2月6日,大学院令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7月1日,浙江大学正式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作为校长的蒋梦麟,想利用北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方法来改造浙江大学。1928年3月25日,胡适收到蒋梦麟的来信,说要办浙江大学文理科,要胡适去办哲学与外国文学两个系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

科。胡适推辞了,但他向蒋梦麟推荐北京大学的陈源去办外国文学,要蒋梦麟自兼哲学,请北京大学教授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后来由于蒋梦麟做了教育部长,浙江大学的事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浙江大学的真正崛起是在竺可桢手中。

竺可桢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是郑晓沧向陈布雷推举的,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梦麟想利用北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方法来改造浙江大学没有成功,而竺可桢利用南京中央大学的师资力量来改造浙江大学却成功了。

竺可桢1910年与胡适同时考取庚款留美学生资格,1918年获

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改制为东南大学后,仍留任。1922年《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办时,他不是主要成员,但与《学衡》杂志的诸多同人是朋友。

浙江大学文理科的师资主要是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和中央大学的教授。可以说竺可桢从中央大学带来了四位关键人物:文理学院(理学院)胡刚复、两任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张其昀和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特别是文史地的师资基本上是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和中央大学的教授。“学衡派”的文化精神的承传主要是在文史地学科。

抗战期间,在江西还出现一所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是胡先骕,不少师资是他从原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带过去的。中正大学自然是因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而兴。

### 教授的学术权力

1920年代、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多次发生校长被自己学校的师生驱赶之事。许多著名的校长都没能逃此一劫,呈现出极大的尴尬。有的人便狠下决心,从此离开大学或教育界。当然,有的是不得不离开,因无法再在教育界混下去。

先说清华大学。这所大学的1920年代,是在校长曹云祥手中而兴,1930年代是在梅贻琦手中而盛。曹、梅之间(1928年1月—1931年12月),清华大学换了严鹤龄、温应星、余日宣、罗家伦、吴南轩、翁文灏6位校长。而罗家伦、吴南轩分别是被学生代表大会和教授临时会议决议驱赶走的。

再说中央大学。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央大学校长,但师生强烈反对,三个星期下来,他不得不辞职。随后是刘光华的辞职。中间几个人都无法接稳校长这个担子。6月28日,段锡朋被政府任命为校长,中大师生干脆以暴力行动把他赶走。有着驱赶和拒绝接受政府新任命校长传统的中央大学,到了1943年,又连续拒绝接受吴南轩、陈立夫来做校长。中央大学21年

间,有13人出任校长。出任过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也不被中央大学接受。其中张乃燕也是被教授逼迫辞职的。仅1932年,就走马灯似地换了5人。这里就显示出一种在大学体制内存在的与政府任命的校长之间的对立力量,即“学术权力”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作用力。政府的任命和被任命的校长,这二者是“政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合。而大学的学术团体的统治,是与专家仲裁的思想相吻合的。教授的“集团统治”力量和可以指使并利用的“学生力量”的结合,是学校很大的势力。这种力量常常会和前者发生矛盾冲突。一旦冲突不可调和,辞职或被驱赶的必定是校长。因为校长的个人权力和相应的统治,是“政治权力”和“官僚权力”结合的产物,而大学的“教授集团”所统治着的学术团体(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力量,是学术团体活动有机的核心势力,并像载舟的水。当一个人和强大的群体对立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赋予了教授和学生这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术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多次战胜了政治和官僚的强权统治。这是民主精神的胜利,因为只有民主精神才能使大学的教授、学生具有选择自己校长的自由和权力。这也正是欧文·白璧德在《学院与民主精神》中所说的“学院需要民主精神是一个公平的没有偏袒的场所,而且它的要求越严格、越具有选择性越好。”

### 罗家伦校长的新风范

蒋梦麟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我以为一个大学的知名度实际上是取决于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现有知名教授、现任校长的人格魅力和能力。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大游行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便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是胡适的得意弟子,始终对教育和政治抱有强烈的双重兴趣,北京大学毕业后经胡适推荐赴美国留学,并游学欧洲。归来后,曾参加北伐,因得蒋介石的赏识,一度从政。1928年9月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原清华学校本是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由外交部管理。教育的西化和自由的风气很浓。罗家伦 31 岁的年纪，便做到清华大学校长的位置，春风得意，自然也就盛气凌人。当然他也不知道这所学校“水”的深浅，一年零九个月后（1930 年 5 月）便翻了船，因压制教授自治和学生运动而被清华师生赶走。

1932 年 8 月 26 日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9 月正式上任。相对于西化、自由的清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是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改制过来的，这所学校有着自己的传统，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新文学的对立，使她形成了自己文化保守的校风和学风。而昔日北京大学的激进人物来保守的中央大学任校长，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原有身份变色，否则会重蹈覆辙。吃一堑长一智。罗家伦选择了与保守的中央大学师生的趋同，起码是在形式上。他事先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点。而对中央大学师生的文化保守行为，如反对新文化—文学、坚持写旧体诗词和尊孔，他敬而远之，不表态、不支持、不压制。只是因“九·一八”事变的强烈刺激，他在“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和中央大学的师生一道，为学校的发展寻求到了共同的机会和利益。1932 年 10 月 17 日在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了《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说，借“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条路径，使他真正走进和融入了这所大学。从 1928 年到 1949 年的 21 年间，有 13 人出任过中央大学校长或代校长，而罗家伦一人的任期是 1932 年 8 月～1941 年 6 月，可以说基本上是干满 9 年。

此时，罗家伦是有意在学习自己的老校长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也正是他的这种办学方针，中央大学才会有众多的学术刊物出现，才会有 1930 年代仍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现象（不允许新文学进大学课堂的国文课程设置），有公开、鲜明的尊孔复旧活动。《国风》自然是这种行为的代表，也最能体现“学衡派”后期的文化保守倾向。